

当代浙江 文学概观

1984—1985

955

35

郭志今 刘卫主编

DANGDAI ZHEJIANG WENXUE GAIGUAN

封面设计 邵秉坤
责任编辑 刘 洁

285
当代浙江文学概观

郭志今 刘 卫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230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统一书号：10337·006 定价：1.70元

目 录

长篇小说述评.....	徐 萍 (1)
中篇小说述评.....	骆寒超 (14)
短篇小说述评.....	许 钢 (37)
诗歌述评	沈泽宜 (48)
戏剧文学述评.....	林晓峰 (71)
报告文学述评.....	沈济萱 王养兴 (87)
散文述评	李烈钧 (102)
杂文述评	于泉源 (115)
通俗小说述评.....	盛钟健 (125)
儿童文学述评.....	晓 舟 (139)
文学评论述评.....	魏 丁 (153)

徐孝鱼小说简评	鲁 人 (163)
王旭烽小说简评	今 古 (173)
赵锐勇小说简评	胡 敏 (187)
曹布拉小说简评	湫 海 (198)
柯平、伊甸诗歌简评.....	沈泽宜 (212)

张思聪剧作简评 文 声 (224)

短篇小说要目 (239)

中篇小说要目 (247)

长篇小说要目 (250)

诗歌要目 (251)

剧本要目 (265)

报告文学要目 (269)

儿童文学要目 (275)

后 记 (283)

长篇小说述评

徐 萍

一九八四、八五两年间，浙江长篇小说的数量虽然还不多，只有五部。但是，在主题与题材的拓展上，在风格与技巧的探索上，在人物的塑造方面，都比前六年（粉碎“四人帮”至一九八五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仅有的五部作品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浙江长篇小说创作新的转机和良好的发展势头，看到了希望和灿烂的前景。

一

人们往往把长篇小说称之为反映时代风貌、反映历史、反映生活的“史诗”，也就是说，读者通过它，能够了解到这个时代的政治风云、经济发展、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等等。特别是在当今的改革年代里，人们对小说创作（包括长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能够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他们曾经或正在经历过、思考过、实践过的现实生活，以得到生活的启迪、美的享受。然而，改革，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在浙江长篇文坛里却一直是个空白。直到一九八五年青年作者高锋《太湖鸟》的问世，才填补了这块空白。

《太湖鸟》主要是通过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各种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观念的描述，来揭示时代的某些特点。作者的用意是表现在改革和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人们的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正在起着剧烈的变化。以雪羽、莫亚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追求与老一代人已经截然不同了，年轻人追求时髦、新鲜、开放，向往新的生活，但有时免不了有点出格。以章仪凤、鱼狗老爹为代表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们，虽然还死守着自己的“英雄绝技”，但他们的“绝技”是早已经被时代所淘汰了的东西，这使他们陷于穷途末路之中。然而，作者引导人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时代的不断文明，那些与时代前进节奏不相符的技术被淘汰是容易的，但要消灭那里愚昧、落后、无知、野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鱼狗老爹的起死回生，便是一个有力的象征。他顽固地要把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野蛮的打鸟技术传授给他的尚不懂事的小孙子，使这些落后、愚昧、无知的东西后继有人。这说明，那些愚昧、野蛮、落后的东西是根深蒂固的，与之进行斗争是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甚至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作者比较准确地把握住这个富有哲学意义的题材，并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新旧交替时期的生活进行深刻的思考，对题材作深层次的开拓，这在新时期浙江长篇创作中还不多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太湖鸟》的诞生，标志着浙江长篇创作发生了新的转机。

与前六年相比，八四、八五年长篇创作的一个明显进步是，作者们特别是青年作者比较注意不受题材表面意义的束缚，对主题的揭示比较注意当代感和理代意识。前六年许多长篇之所以无人问津，惨遭冷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尽管有些作品出自老作家之手，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经验，写作技巧颇为娴熟，但由于作家的创作方法、思维方式缺乏时代感，缺乏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因此他们的作品总免不了有远离时代之感。

然而，闻波《陌生的土地》写的也是过去的生活，但他在反思我们民族历史的时候，在探究民族的落后根源的时候能够从现代意识的层次上加以观照，因此，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光彩。小说写的是，王、赵两个家族由宗族隔阂引起的一系列械斗和所造成的悲剧。小说以“龙”为串针线，以王佑庆为主角，把舞龙作为主要情节来展开，通篇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是龙的传人。本来，他们应该理所当然地团结起来，共同战胜梅河泛滥等所造成的自然灾害，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获得美满的爱情。可是，狭隘、愚昧的宗教偏见，使得同一祖宗的自己人成了敌人，他们不思改变贫穷的生活现状，不思创造美好的未来，却陷入了无休止的宗族械斗之中；这种愚昧的宗族偏见，使得应该做的事偏不做，不该发生的事却接二连三地发生。梅河泛滥，东关村遭殃，这纯属自然灾害。而对天灾，村民们屋塌人亡，作为赵氏族长的赵文海，理该召集有识之士，商议如何治服这凶狠的梅河，加固堤坝才对。可是，赵氏家族中的耆老聚在一起不是议论、商讨治理梅河的办法，而是把梅河所造成的损失、灾难统统归咎于王姓家族，于是乎，一场更大的宗族械斗事件便酝酿而成了。宗族的偏见，狭隘的心理，愚昧和无知，是造成我们民族落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作者从民间艺术兴衰史这个角度，重新度量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化结晶的古老民族的双重性，即既有勤劳、勇敢、智慧、富有创造性的一面，又有愚昧、无知和落后的一面，文明和古老令我们自豪，但愚昧和落后又需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去改造它，消灭它。这一主题，正是我们当代人所思考的问题，也是当代人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说，《陌生的土地》的作者，在把握、选择这个题材的时候，具有比较自觉的现代意识，他已经能跳出题材浮面意义的过大的依赖性，能够使主体的目的性和客体的规律性取得融洽，因此某种相对的自由境界出现了。他把“龙”这个古老

的话题，“舞龙”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放到我们这个民族历史长河中去加以思考，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和民族性格重新进行思考，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内涵。

二

八四、八五年浙江长篇小说的创作者们不仅注意题材和主题的拓展，把自己对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在生活中得到的那种“觉”和“悟”，通过作品介绍给读者，而且他们也开始注意作品的结构和叙述方式上的某些新的探索。

《太湖鸟》采取了两条平行线索结构方法：一条线以章仪凤为主角，另一条线以鱼狗老爹为主角，两条线索互相平行，使力均等。所不同的是，描写鱼狗老爹这条线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描写的，而章仪凤这条线索，在时间上的跳跃性较大。这种时间上跳跃的特点是，作者根据需要，自由地将时间概念从古拉到今，或从今推到古，中间没有作特别的说明，全凭对生活本身的真实描写。如第一章，作者写到章仪凤为了使祖传的手艺不在他这一代失传，便去鸟市看行情，想买白鹤之毛，制作一把羽毛扇。这里既写了章仪凤逛鸟市的情景，也写了鸟市的历史，它曾经兴旺的景象。但是在这些时间跳动性很大的描写中，作品主要是让生活本身说话。在描绘鸟市的历史画面时，出现在画面上的是那些腰眼里挂块打簧金表、手指头上套个玉镯的白相客，身穿竹布长衫的手艺人。而在说明章仪凤是现在在逛鸟市时，作品首先用了一组简单的对话：

“要跑码头，我还不来找鸟市哩！这门行当，现在早过时了。谁要看白鹤摆噱头，动物园里饱得了眼福。”

“哪里有……白鹤？”

“动物园。我去过……”

“哈哈……”

这里，“动物园”、“早过时了”等字眼便点明了时间，将时间一下子从过去拉到了现在。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历史与现实紧紧地揉合在一起，给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

作者在作时间跳跃时，用的是“全知角度”，即作者从旁观者的身份出发。但作者并不十分注重追逐偶然性事件做文章，而是注重必然事件的描写，即向生活开放，试图从平淡无奇的生活拾取闪烁真理的贝壳，尽可能保持生活的原貌，不对生活作人为的加工、浓缩和强化。于是，作者观察角度从“全知角度”变为“目击者角度”。所以，作品对于生活表象的描绘是不惜笔墨的，使人感到，似乎有一双无形的眼睛，或无形的摄象机，居高临下，时时注视着那里，它们所及的一切，都详尽地毫无保留地将它记录下来。如对街景的描绘，写小吃店的兴隆，就力图写出小吃的色、香、味来，使得你也赞不绝口，垂涎三尺；写街上的景象，不但写到卖虾的老太婆的鼻子红得象熟透的李子，骑自行车的人扔下几个镍币撮了葱便蹬车驶去的情景，就连刚出笼的鸡鸭沿街懒笃笃踱着，不停地擦屁股拉稀屎的情景也把它记录下来。如果不加认真体会的话，会觉得这些描写是多余的，与情节发展无关，还有点自然主义的味道。但细心品味起来，却可见作者的苦心所在。时代性、当代感、现代意识，这些词汇孤立起来都是十分抽象、空泛的概念，但是反过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变化，从人们的吃穿住玩到村落、街市的变化，无不带有时代的影子，无不体现着强烈的时代气息。聪明的作家既全景式地、整体地、客观地把握生活，又把自己溶汇在丰富多彩、绚丽多变的生活洪流之中，并选取恰当的角度，再来展现生活，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作品了解到时代变迁的轨迹。

然而，作者在以“目击者”身份观察生活时，并不仅仅停留在对生活表象的描绘上，而是把描写的重点放在人物的行动上，通过人物行动，来揭示他们各自复杂的心理活动。章仪凤为了寻找白鹤羽毛，不顾身患绝症，从医院“逃”出来，去拜访彩凤坊的六指头老钱，他琢磨着老钱说不定会藏着几片白鹤羽毛，因为钱家过去做羽毛扇的名气也是很大的，比章家差一点的只是当年没能有机会去进贡皇帝。章仪凤兴致勃勃的去找老钱，可事实并非象他想象的那么顺当。首先，冯太太施计不让他与老钱见面，并演了一场所谓赶老鼠的闹剧。等到六指头好不容易从楼上下来，姓钱的明知章仪凤的来意，却漫不经心，扯七扯八，就是不把话题点破。章仪凤无奈，只得硬着头皮直说，六指头听了，哈哈大笑，霍地从椅子上蹦起身，说了句含义复杂的笑话，“白鹤羽毛？有是有，可还长在白鹤身上呢。”对这种颇含拒绝之意的语言，章仪凤还是不死心，六指头只得等老婆的口气。而冯太太实质上与老头儿是一唱一和，表面上却装得十分慷慨的样子，说：

“床底下塞了这么多羽毛，孝顺老鼠么？章师傅要，还是看得起你呐。”话说得慷慨，可模样挺古怪，朝她的男人巴得巴得挤了几下眼睛。对于老伴的“慷慨”和挤眼，六指头心领神会，但他还是不肯吃亏，马上想到，一旦成功，政府发奖什么的，他也要有份，而章仪凤对什么奖之类不感兴趣，于是说“全数归你”，听到此，六指头才装模作样地上楼去寻找翎毛。可是，章仪凤在老钱那里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就连老钱过了鼠年搬了家他也不知道，这里，通过三个人物的行动、对话，使各自的形象活灵活现。章仪凤求翎毛之急的心情，老钱夫妇谙熟世故的处世本领都可见一斑。可见，运用这种“目击者角度”观察生活的方法，对于更好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复杂的社会世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这种对生活作详尽描写的作品，最忌讳的便是繁琐。

这种情况在某些现代派作品中时常可见。有的作家过份强调客观的描写，结果，看到什么便写什么，使文学作品成了繁杂的物件和行为的记录，这种作品脱离了文学创作的最终原则，没有任何社会意义，是不可取的。《太湖鸟》的作者，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同时吸取了当代一些新的创作方法，使作品对于生活的详细描写，显得生动、精炼，又不繁不俗，这是作者努力探索的结果，也是作者熟悉生活，比较准确地把握生活的结果。

与高峰《太湖鸟》的追求正相反，张晓明的《“末代”大学生》不主张对生活本身作过分细致的描述，追求的是一种热情洋溢的抒情诗般的风格，把对生活过程的具体铺叙揉合于抒情之中。首先，作者在描述一群因“文革”而中途辍学的大学生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风云变幻的山区小城里的生活遭遇时，采用的不是客观而冷静的描述手法，而是带有一种不可抑制的主观色彩和激越之情，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对他们的憎和爱。如对齐济和他的同学林旭东、蓝云溪等人，坚定地冲在时代潮流的前列，虽历经磨难而不悔，在恶劣的环境中忠于生活，忠于爱情，节操自守的品质给予了热情的赞颂，而对关鸣洲等人失去理想，失去生活目标，政治上看风使舵，投机钻营给予了严正的批判，但对他的不幸也寄予了同情和怜悯。其次，作品中用了许多排比和直抒胸臆的段落，以直接抒发作者自己的感情。如：“山，无穷无尽的山。每翻上一道岭，他都要回头看看已走过的路，曲曲弯弯的盘山公路……”“山，无穷无尽的山，每翻上一道梁，他都要站一会，往前看看，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这里，作者用诗一样的句式，将齐济等“末代”大学生所经历过的坎坷不平的生活之路比喻成是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的盘山公路，表现了作者作为“末代大学生”的同时代人对他们的特殊命运的深切反思，特别是作品中许多富有诗意，发人深思的议论和抒情，使我们摸到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与书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脉搏。

如：“还要等多少年，这种对个人生活大动干戈的举动才能消失呢？什么时候，这种一旦有权，即可置人于死地的状况才能改变呢？为什么有些人，并没有从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继承下最可贵的遗产——文化。而有些掌权的人，却只继承了最不该继承的糟粕——弄权和整人。”这里，既表现了作者对因有人耍权术，林旭东夫妇长期分居，不能调在一起的强烈不满，也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畸形的社会形象的愤怒和抗议。第三，作者往往在一章的结尾处，把人物将来的命运提前告诉读者，以引起读者对他们的关注。如关鸣洲与石竹的爱情悲剧，作品在一开始就予以点破：

“关鸣洲赢得了爱情的这个回合。石竹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命运之路。”作者之所以这样做，而不是让人物的行动来客观地表现，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将生活的具体叙述揉合于抒情之中的结果。也就是说，作者追求的并不是对生活本身作客观的描述，而是迫切要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告诉人们。这种方法处理得好不失为一种风格，如处理不好，使抒情与议论份量过大，淹没了要描述的生活本身，就会使作品失去预期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晓明在这方面的处理还是成功的，许多抒情和议论深化了主题，也激发了读者的情绪。

应当指出的是，从新时期浙江长篇创作的情况看，自觉追求作品的独特风格，在创作方法上有所创新的作家还不多，即使象《太湖鸟》这样读者比较首肯的作品，在总体结构上，其优点是突出的，而其缺陷和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比如，作者试图通过莫亚、雪羽这条线索来实现历史的延续与反思，但由于对莫亚、雪羽的描写较为简单化、概念化，对象莫亚这类有所追求、有所思考，但又缺乏深度的现代青年性格的刻画，比较肤浅，尚未抓住他们的本质特点，因此，通过这条线索来实现对历史的反思的目的并未达到作者所预期的效果。这种结构上的前重后轻，前实后薄的缺点，恐怕是年轻作家易犯的一个毛病。

闻波的《陌生的土地》也是这样，作者能够把过去的生活，放在历史和时代的天平上，重新进行估量，反思历史，思考生活。作品把舞龙作为主要情节加以展开，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长篇，以“陌生的土地”命名，把前几章辛辛苦苦，精心经营的开头，最后仅仅归结为“龙”的艺术的兴衰，失去了作为长篇应有的气势和规模，影响了小说的社会内涵和深度。从构思上看，作者对前六章的布局讲究，所要揭示的主题比较明确，花的力气也多，因此，写得较为厚实。当写到王佑庆出牢以后的生活，作者创作的思路似乎有点迷惘，主题应该往哪方面挖掘，使小说的内涵更加深刻更加丰富，缺少一种深入、周密的思考。于是乎，作品只得从最浮面的一条线索“龙”的艺术为追踪线，使本来可以成为一部很好的小说，很可惜地成了一部描写民间艺术的兴衰史。

(三)

我们之所以说八四、八五年浙江长篇创作较之前六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另一个重要的依很就是，在这两年发表的新作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容量并焕发着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如《太湖鸟》中的鱼狗老爹、章仪凤，《陌生的土地》中的王佑庆、赵文海，《碧海绿》中的海蛮、海妮，《“末代”大学生》中的齐济、关鸣洲，《动摇》中的周梦健。许多作者注意从整体上把握人物性格，寻找其性格形成的积淀物，挖掘其性格发展的脉络。

我认为，在这些不同性格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中，应当首推的是《太湖鸟》中的鱼狗老爹。这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丰富的人物，他既有骁勇、强悍、执着、勤劳的品德，又有愚昧、顽固、残忍、暴戾的劣性。他的优点与缺点是那样的明显，又是那

样紧密地联在一起，使人简直无法用语言评判他。作为太湖上的打鸟能手，对于打鸟这门行当，他是那样的挚爱，他把枪当成自己的魂。哪一日不摸枪，哪一日就难熬。谁反对他打鸟，谁就是他的仇敌。他的生活哲学是：“在这世上，谁给你一撮火药，你就还谁一头大鸟；谁尿湿你一只鞋，你就扔谁一泡尿。没别的，做人就得这样”。的确，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对于听他的话，依顺他的，不管是谁，他哪会感激不尽。他一辈子拼死拼活地打鸟，不念别的，只求有个响亮的名声——“老鹰儿”。可是，做寿那天，那些来祝寿的老大们谁也不这么称呼他，他极为失望，倒是他十二岁的孙子顺口说了句“阿爷——象老鹰！”，使这个三榔头打下去都不叫疼的硬汉子高兴得鼻子发酸，声音发涩，称他是祝家的好子孙，并在激动之下，收下孙子当徒弟。但是，对于得罪过他的人，他却会记恨一辈子不反悔。如他与章仪凤的关系，因为他抢了章的妹妹为妻，章家对这门亲事不满，他就与他们四十多年互不来往；就连儿子天运，因不愿继承父亲的打鸟行当，鱼狗对他也视如仇敌，认为他不配当祝家的后代。谁跟他过不去，跟他不够朋友，他就会给谁好果子吃。一次他与船老大孟扣约好，他与孙子鸭虎搭他的船，可到时候，孟扣不等他们到，便将船开走了。鱼狗老爹好不气恼，便命令孙子朝孟扣的船开枪，至于后果如何，他压根儿没考虑过。

野蛮、残忍，往往与愚昧是联在一起的。鱼狗老爹在芦滩、在打鸟的“战场”上称得上是一个翱翔天空的“老鹰儿”。但是，在文明的天地里，他却是个可笑的瞎子，可怜的“虫儿”。他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直到自己因违反国家关于保护珍贵鸟类的通令，被关进了拘留所，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犯法，住在何处。甚至还可笑地建议民警将班房改成客栈，这样可以赚钱。这种令人可怜又令人可笑的言行，使人自然地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阿Q。当然，他毕竟不是阿Q时代的阿Q，他是新旧交替时期的旧人物，

他的存在与新的时代与文明的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他却顽固地存在着，即使到了断气了十天十夜，人们要为他准备葬礼的时候，他还能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这真是绝妙的描写。由于作者从历史的高度把握这个人物性格，把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物与新社会文明时代的矛盾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使人物增添了艺术光彩，富有立体感。特别是起死回生这一绝妙的，颇有传奇色彩的情节，给人物赋予了哲理性，增强了深刻的社会性和思想内涵。鱼狗老爹这个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他是几年来浙江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个难得的艺术形象。

章仪凤与鱼狗老爹一样，他们都是时代的“最后一个”者。作品对章仪凤这个人物花的笔墨比较多，但由于作者对鱼狗老爹这样的人物性格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因而描写起来得心应手，写得比较活；而对章仪凤这样的人物，作者有所了解，但了解得、特别是理解得还不深，尚未抓住这个人物的性格内核，因此，虽然对他的言行也描写得细致入微，但没有写出他性格丰富性和复杂性来。比如同样是写死，鱼狗老爹的起死回生写得生动形象，又写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而章仪凤的得癌症住院，又为了搞到白鹤羽毛而“逃跑”，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与鱼狗老爹的断气十个昼夜后起死回生，又要拨弄枪药，又要顽命，有着同样的意义。但由于鱼狗的起死回生也好，又要顽命也好，始终与他的“魂”——枪和打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章仪凤的癌症与做白鹤羽毛扇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许正是因为作者描写两个“最后一个”者的情节太相似，一个是最后一个的打鸟汉子，一个是最后一个的做白鹤羽毛扇的人；一个为了自己的绝技有人继承，招了孙子为徒弟，一个为了使祖传的手艺不绝迹，想叫女儿继承；一个是起死回生，一个是得了癌症，……这种情节上的相似，必然导致人物形象社会意义的类同。在同一作品中，两个意义相同的人物，运用相近似的情节，从美学意义上讲没有太大价值，从作品的实

际情况看，两个近似的人物，如果一个光彩夺目，另一个必然黯淡些。

从近两年长篇作品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反面人物的描写，许多作者都能冲破脸谱化的框框，给人物以更多的人的本来面目。如《碧海绿》中的王荡海、贾神仙、陈富之，《陌生的土地》中的赵文海，他们都是欺压穷人的坏蛋，这样的人物在以往的文艺作品中司空见惯，但上述作品的作者能从框框中跳出来，以常人的心理去思忖这些反面人物的心理，在揭露他们残忍、凶狠、刁诈的同时，也写出了他们的另一面。

特别是《“末代”大学生》中对关鸣洲这个人物的描写，显示了作者观察生活的深邃的目光和对生活独到的见解。关鸣洲这位“末代”大学生与许多同时代青年一样，对生活也曾经有过热烈的追求和美好的理想，在正常的年代里，这样的人只要引导得好，肯定是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可是在动乱的、人妖颠倒的年代里，他走上了歧途，值的理想，他的追求偏离了一个人起码的良心和道德，他开始投机钻营，看风值舵，于是乎，在好人受难，坏人当值的时候，他飞黄腾达了起来。为了捞政治稻草，他不惜出卖良心，背着心爱的未婚妻，去搞对岳父的揭发材料，虽然在这中间，他有过痛苦，想止步不前，但骨子里一心想往上爬的思想，致使值“革命不需要发抖的手！”然而，尽管关鸣洲有许多从古至今的政治知识和“革命”的阅历，又有勃勃的政治雄心，但值毕竟是一个小小的小人物，值的命运、沉浮是被别人所掌握、所左右的，特别是象值这样的人只不过是畸形时代的产物，一旦这个时代过去了，他们便是最直接的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所以，作品在描写他时，一方面竭力渲染他政治上得意之时那种忘乎所以、志高气扬的姿态和他在他们那一派中的苦恼；另一方面，作品也细致地描述了他政治上失意之后的满腔牢骚和可怜相。同时，作品将他政治上的失败与生活上的失败交织起来写，值梦想

着政治上失败了，但还有一个心爱的妻子。虽然他与妻子一起被贬到了偏僻的山区，他想从此与妻子一起好好地生活，政治上失意，爱情上补。可是，他哪里知道，在他出卖良心的时候，他的妻子石竹早已从心灵上抛弃了他，与他在一起，只不过是可怜他。一旦当他知道，石竹已经不爱他，并决定要走自己的生活之路的时候，他无法控制自己，歇斯底里大发作了，他怎么容忍得了双重的打击呢！所以，对于每一个接近他妻子的男子，他都要怀疑，要恶狠狠地把他们骂出门去，甚至不惜同学之情，写信控告自己的同学。作品把这个政治上的失败者，生活上的可怜虫，刻划得入木三分。这个人物描写得好，好就好在对于这样的人物，作者没有把他简单化，概念化，而是把他复杂的性格、心理，复杂的遭遇，以及作者对他又有批判又有同情和怜悯的复杂感情，都写出来了。因此，这个人物显得比较有生气，其性格和命运表现了一定的时代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近两年浙江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势头是好的。但与全国水平相比，无论是创作的质量或数量，都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然而，就我省长篇小说的创作情况看，近两年比前一时期，毕竟有较大的进展，这是值得欣慰的。我们期望早日赶上全国的水平。